

臺灣酒文化中的「酒」與「酒禮」

徐 瑋 瑋

〈摘要〉 本文以臺灣酒文化為研究對象，探討酒在臺灣社會中的重要性與地位。酒在臺灣社會中不僅是社交活動的重要媒介，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本文將從酒的文化意義、酒禮的演變以及酒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三個方面進行探討。首先，酒在臺灣社會中具有悠久的歷史，其文化意義深厚。其次，酒禮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變遷，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最後，酒在現代社會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消費模式與文化內涵已發生顯著的變化。

酒在臺灣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僅是社交活動的重要媒介，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本文將探討酒在臺灣社會中的重要性與地位，並分析酒禮的演變與現代社會中的角色。酒在臺灣社會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作為社交媒介的功能，更在於其承載的文化意義。酒禮作為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變遷，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酒禮」一詞，最早見於《禮記》中的《酒誥》篇，是周代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酒禮不僅規範了飲酒的行為，也體現了社會等級與道德觀念。在現代社會中，酒禮的內涵已發生顯著的變化，但其作為社交媒介的功能依然重要。本文將探討酒禮的演變與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並分析酒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與地位。酒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作為社交媒介的功能，更在於其承載的文化意義。酒禮作為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的演進而不斷變遷，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DOI: 10.11634/j.1674-3668.2023.01.001

【註】 1. 本文參考了徐瑋瑋（2020）的相關研究，特此鳴謝。

现代外国 哲学

XIAN · DAI · WAI · GUO · ZHE · XUE

11

主 编：汝 信

副主编：李惠国 姚介厚 袁淑清

编辑组：沈恒炎 罗嘉昌 徐友渔 周国平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当前西方哲学的若干重要趋向	岳长龄 (1)
---------------------	---------

* * *

〔结构主义研究〕

评福科的后结构主义权力理论	徐崇温 (18)
---------------------	----------

后结构主义概观	汪堂家 (40)
---------------	----------

结构主义的源头——索绪尔的语言学	唐有伯 (65)
------------------------	----------

哥尔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	尹大贻 (94)
--------------------	----------

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	陈晓希 王至元 (120)
------------------	---------------

人文科学谈话中的结构、符号和活动.....	[法]J·德里达 (151)
-----------------------	----------------

关于结构主义的两篇书评	周莉克摘译 (173)
-------------------	-------------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社会思想的来源

——《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主义与社会学理论》评介

.....	杨 黎 (179)
-------	-----------

《结构主义时代》评介	金 黎 (193)
------------------	-----------

皮尔士实效主义认识论中的主观理性活动和

外展臆断推理	葛 力 (199)
--------------	-----------

论游戏图式

——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综合研究	舒炜光 (213)
------------------------	-----------

维根斯坦是否反对“形而上学”呢?	范光棣 (241)
------------------------	-----------

第十一届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纪实	舒炜光 (251)
------------------------	-----------

萨特入学与马克思主义	万俊人 (256)
奎因的本体论学说	彭信俄 (288)

〔资料选登〕

让·皮亚杰(1896—1980)	〔瑞士〕爱德华·马尔巴赫 (张继武 倪梁康译) (304)
维特根斯坦与奥地利哲学	〔奥〕鲁道尔夫·哈勒(李真译) (331)

CONTENTS

Today's Important Trends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Yue Changling*

Researches in Structuralism

The Review of Foucault's Post-Structuralist

Power Theory..... *Xu Chongwen*

The General Feature of Post-Structuralism

..... *Wang Tangjia*

The Origin of Structuralism—Saussure's

Linguistics..... *Tang Youbo*

Golderman's Generic Structuralism..... *Yin Dayi*

Piaget's Structuralist Methods

..... *Chen Xiaoxi Wang Zhiyuan*

Structure, Symbol and Action in Discourse of

Humanistic Sciences..... *J. Derrida*

Two Book Reviews on Structuralism

..... *Trans. by Zhou Like*

The Origin of Structuralist Social

Thoughts of Levi-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evi-Strauss”..... *Yang Li*

The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ime of

Structuralism” *Jin Li*

The Rational Action of Subject and External

Arbitrary Reasoning in Peirce's Pragmatic

Epistemology.....	<i>Ge Li</i>
On the Picture of Game	
—A Synthetic Study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Shu Weiguang</i>
Is Wittgenstein Against "Metaphysics"?	
.....	<i>Fan Guangli</i>
A Note on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ittgenstein.....	<i>Shu Weiguang</i>
Sartre's Humanology and Marxism.....	<i>Wan Junren</i>
Quine's Theory of Ontology.....	<i>Peng Xin'e</i>

Philosophical Data

Jean Piaget (1896—1980)

Wittgenstein and Austrian Philosophy

当前西方哲学的若干重要趋向

岳 长 龄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勾勒从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趋向的线索。这些新趋向有三个方面：（1）哲学视野和领域的扩大，表现为确定哲学问题、采取哲学体系根据上的开放性，方法论上的宽容和多元态度，以及各种思潮的交融。（2）注意加强哲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应用的转向”和“文化哲学”的转向，突出表现为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的复兴。（3）主体性和实践问题是哲学争论的焦点。

在这20世纪已近尾声，21世纪微露曙光的时候，对当前西方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一概观，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面对西方哲学纷纭复杂的局面，本文只想尽力理出一些线索来捕捉它。

“当前”，一般说来是从60年代开始。^①20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和令人瞩目的新趋向。这些新趋向概括地说来就是：哲学视野和领域的扩大（确定哲学问题、采取哲学体系根据上的开放性，方法论上的宽容和多元态度，各种思潮的交融）。注意加强哲学社会文化功能的“应用的转向”和“文化哲学的

① J. A. 帕斯默尔：《当今的哲学家》，序言，1985年。

转向”，集中表现为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的复兴。主体性和实践问题是哲学争论的焦点。

一、哲学领域的扩大和“应用的转向”

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领域是认识论。“独尊认识论”可以说是从笛卡尔以来 300 年间西方哲学的最大特色。而其中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又是一条连绵不断的主线。这便是为理性或知识大厦寻求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一个真正的起点，一个能担负起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建构的“阿基米德点”。这个问题被处理得过分膨胀。到本世纪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分析哲学的产生更把这个传统推进到新的阶段。他们认为找到了哲学的“真正的基础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严格方法”。认为通过对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析，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问题。或者是通过对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找到科学的永恒不变的方法及合理性标准。或者是通过精确阐释人们常用的概念来促进社会、政治、道德等众说纷纭的问题的解决。哲学只是这样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和活动，不应当也不可能回答实际问题。哲学必须与形而上学问题，与经验科学，与社会政治问题严格划分开来。这样一来，哲学便被圈进了狭小的领域，哲学家便真的钻进了象牙之塔。由于语言分析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使这种哲学工作具有了特殊专业的性质。它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引起少数人的兴趣，而广大群众是无力和无心问津的。“分析哲学被一种经院主义的气氛所包围”。这种哲学自称是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的确作出了一些贡献，但它又远离了科学史和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由于“科学主义”的偏见而忽视价值问题，忽视对文学和历史的需要，远离社会生活的争论。这种情况在英美尤为突出。拿美国来说，从 4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

期为止,由于分析哲学取代老的实用主义而占统治地位,美国哲学的主流经过的大体上是一条与社会现实隔离的历程。这段期间的社会、伦理哲学细密而乏大义,精致而无生气,对现实的世界或社会中的其他文化活动很少冲击的力量。杜威当年曾评论过这种情况:“在现今的哲学里头,已经少有人对于哲学具有检视当前严重问题的能力保持任何信心。信心的缺乏充分表现在对技巧翻新的关注上,也表露在对以往的哲学体系的反复玩索上。就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两方面的研究兴趣都无可厚非,但以前者论之,哲学的改造之道不能只注重形式而敞开实质内容。而现在的情形只在发展技巧的使用,琢磨更纯粹的形式技巧。以后者论之,如果学人因探究过去而积累起来的学问不能用来阐明困惑今人的难题,那么哲学的改造工作也不能仰仗这样的学问。”^①

上述情况到了6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震荡。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冲击。抗议越战的浪潮,青年运动,黑人骚动震撼了全国,唤醒了美国人民“沉默的多数”的大部分阶层积极投入社会活动。而分析哲学家的教条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无力。处于这种沸腾的局面,用分析词义的方法是难以应付的。因为人们要求哲学对当时发生的许多社会政治的和道德的问题发表内容切实、言之有物的意见。另一方面是由于分析哲学理论上内在的困难,“确定性”的寻求没有着落,要建立不带形而上学预设的哲学也不可能,于是以分析哲学为巅峰的现代哲学“独尊认识论”的风尚渐渐地衰落。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形而上学的容忍,另一方面表现为方法论上的多元开放。其他哲学流派(如现象学)的地位开始上升,而且人们开始把美国哲学的希望寄托于实用主义。伦理学(不是元伦理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兴旺起来。道德、政治、法

① 杜威:《哲学的改造》序言。

律哲学家不再限于概念的研究，而是直接评判社会问题的是非。1971年出版的罗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是一个典型代表，它是70年代讨论最广泛的著作之一。种种迹象表明哲学要重返实践。70年代，《哲学与政治》(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期刊问世。80年代由英美哲学家创办的“应用哲学”(applied philosophy)学会和刊物问世。近年来，哲学的实践意义成为整个美国哲学界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哲学家正在千方百计地力图使哲学走出象牙之塔，能对社会起到重大作用。

哲学渗入其他学科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趋势。注重应用的部门哲学、分支哲学随之兴盛起来，甚至出现了“医学哲学”、“妇女哲学”等等这样的分支。帕斯默尔(J. A. Passmore)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1957年时英美哲学界还比较小，刊物也少，著作也不多，到1966年就扩大了，80年代以后，哲学著作如洪水泛滥，冲决了堤坝。现在要确定整个哲学的界限或各个哲学分支的界限已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科学哲学能否明确地与知识社会学区别开来也成了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认识论和社会理论是合流的。科学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离开社会学是不能最后解决的。^①60年代后期，著名分析哲学家W. 奎因便开始论证哲学与科学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普特南(H. Putnam)也论证哲学是物理学的继续，而不是关于物理学过程的元理论。7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普遍了。哲学家只注意概念研究而把经验研究放在一边的作法慢慢发生改变。西德著名分析哲学家W. 施太格缪勒(W. Stegmüller)在其《当代哲学主流》第2卷中，以半卷的篇幅讨论了当代宇宙论和当代理论生物学。认识论也面对着信息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挑战。总之，扩大哲学视野和领

① 帕斯默尔：《当今的哲学家》，1985年，第4—5页。

域,注重哲学的应用,加强哲学的社会功能,这是当前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

由于方法论上的宽容、开放和多元态度,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交融的趋势在加强。二次大战后,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它们的差别和对立。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第一卷中曾一度慨叹这两大哲学运动之间的鸿沟之源。认为在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之间,甚至“连意向关联也没有”,几乎没有交流和对话的可能。^①而近一、二十年内,人们则更多地注意两大思潮之间的共同点。两大思潮的分野再也不与地理界限吻合了,发现这两大哲学运动在早期和晚期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分析哲学的相对衰落,哲学上应用的转向,反映了加强哲学社会批判、社会文化功能的要求。这就同时带来了“文化哲学的转向”。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便是“哲学与文化”。并认为“当代哲学的重点已逐渐从科学哲学转向了文化哲学”。美国哲学家迈克尔默里指出:“近五年来(到1983年)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日常语言分析和存在现象学的进一步巩固,而是对这些学说的批判和质疑,哲学上的注意力转向了语言学、文学和艺术。”^②

上述西方哲学这种“应用的转向”和“文化哲学的转向”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的复兴。

二、实用主义和解释学的复兴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国粹,解释学则属德国的传统。然而这次两者东山再起的趋势却不限于传统的地理界限,相反,恰恰是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0页。

② 《现代外国哲学》,1986年,第9期,第46页。

两个传统的结合。60年代初,有三本重要的著作几乎同时问世,可以看作这种趋势的一个信号和标志。第一本是美国T.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标志着科学哲学进一步实用主义化及解释学渗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第二本是P.温池(P. Winch)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1958)它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具有解释学特征,反对实证主义关于知识和合理性的观点,以及把社会科学看作是幼稚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主张用“语言游戏”、“生活形式”这些概念来分析社会生活。第三本是伽达默尔(H. G. Gadamer)的《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1961)。这是当代关于解释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为了叙述的方便,先谈实用主义的情况。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一个哲学思潮传入以后都要被它所同化或改造。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结合,可以叫做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也可以叫做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化。但从目前发展来看,还是前者较为确切,因为结果是新实用主义彻底否定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而似乎又回复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帕斯默尔说:“美国哲学家到老时都转向实用主义,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①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过程大致可以分五个阶段:(1)二次大战以前,以莫里斯为代表的指导学;(2)二次大战以后,以C. J刘易斯为代表的概念的实用主义;(3)以奎因等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4)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5)最新的以R. 罗蒂为代表的解释学的实用主义。前三个阶段都是吸收、融和分析的方法。然而在奎因阶段即已动摇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理论。奎因的整体论否定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哥德曼(N. Goodman)的真理多元论,观察负载理论的观点,塞拉斯(W. Sel-

^① 帕斯默尔:《当今的哲学家》,1985年,第121页。

lars)的“反基础主义”对“给与的虚构”的批判以及戴维森(D. Davidson)对所谓经验主义第三个教条(即框架—内容的区分)的批判,都进一步动摇了分析哲学的基本理论。第四个阶段首先实现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有趣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逻辑实证主义丛书“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最后一部)。

第五阶段的罗蒂,是在奎因和库恩等人的基础上,结合解释学而提出的一种新实用主义。罗蒂的哲学纲领是企图通过“消解”根深蒂固的西欧式的哲学观,来开创“后哲学文化”。他认为分析哲学已经陷入危机,并进而宣告由笛卡尔开创,经过洛克和康德而到胡塞尔以“认识论”为主导的,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的哲学观念的“终结”。他论证,从黑格尔以来,历史主义思想已经发展了一种文化的观念,这将是一种“后哲学的”文化,即是说,不再有一种领导的学说来综合或评判其他文化领域活动的结果。他认为在最近的文化批判,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的解释学方法及在实用主义哲学中,都有这种后哲学文化的先兆。总之,罗蒂要打消哲学的先验的要求和独立的幻想,认为西方文明并没有可靠的哲学基础或先验证明。他的观点对学院哲学来说具有巨大的反专业化的含义,是一种危机的征兆,即在高等院校中哲学系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教育工作者的危机。这种反认识论的极端主义和文学至上主义,在一部分不满美国哲学的经院气味的人当中受到欢迎。然而罗蒂哲学并没有更具体的文化、政治内容;他的历史主义贫乏和缺少现实的力量。他并不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是批判哲学的专业性。所以有人说他这种极端的反认识论的新实用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新形式,认同现存的秩序同时又支持后现代化的先锋们的反认识论和反形而上学的趣味(主要指80年代兴起的“消解哲学”)^①。

① 参见 J. Rajchman 和 C. West 编:《后分析哲学》,纽约,1985年,第269页。

解释学的兴起更加令人瞩目。本世纪从海德格尔开始，解释学不再只是从属性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解释学。他的学生伽达默尔系统而完整地建立了这种存在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他的《真理与方法》是当代最博大精深的解释学著作。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解释学是本体论的和普遍的。它是本体论的，因为理解指示人的存在，理解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模式。它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而不仅是活动之一；原则上没有超出理解的东西，语言是理解的媒介，而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我们生活的介质或环境。第二，强调理解的历史性。《真理与方法》一个贯串全书的基本线索是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即启蒙运动以来关于理性与传统，理性与成见，理性与权威的对立。认为理性不是可以脱离它的历史境况和眼界的因素或能力，理性只有在活的传统中才能获得它的力量。这不是理性的缺陷、而恰恰是植根于人的有限性中的理性的本质。“成见”也不是坏字眼，而是理解的眼界。他认为对由“成见”（即既定的历史意识）所构成的社会 and 思想文化传统也不应排斥，否则就会否定人的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割断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权威”就是传统的合理性，与盲从毫无关系。理解的过程是解释者个人的“成见”和本文中保留的传统之间的辩证统一，最后达到眼界的融合。第三，理解的语义性。伽达默尔对解释学历史的重要贡献是他的“语言学的转折”。认为理解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心理过程。理解和解释意识总是表现为语言，我们通过语言泄示存在，语言即存在、即存在的模式，他吸收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等概念，人在理解和说明活动中使用语言使“传统”不断演进，也就是从一种“语言游戏”演进为另一种新的“语言游戏”。第四，解释学与实践。伽达默尔著作中最有挑战性和引人入胜的是他力图把本体论的解释学

与实践哲学的传统联系起来。这种实践哲学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对于 Praxis (实践) 和 Phronesis (区别于思辨智慧和技术的实践智慧, 尤指决定目标和达到目标之手段的智慧) 的理解。传统解释学区分解释学的三种要素: understanding (理解), interpretation (解释), application (运用), 认为三者是相互分离的。而伽达默尔论证, 这三者不可分离, 每一理解都含有解释, 每一解释都含有运用。正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对 phronēsis 的分析, 使我们认识到 application 是解释经验中最根本的要素。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对 phronēsis 和 praxis 的理解, 是现代世界最尖锐的问题。理解即是 phronēsis 的一种形式。两个世纪以来, 实践理性已经被降低为“技术控制”。他的哲学解释学就是要捍卫实践的 (伦理的和政治的) 理性, 来反对科学技术理性的统治。在这方面解释学是古典实践哲学的继承者。

解释学正在西方文化中产生弥渗性的影响, 广泛渗透到各人文学科乃至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去。60 年代后期, 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在批判理论家 (法兰克福学派) 的著作中密切地结合起来, 80 年代这种趋势更加强了。如哈贝马斯在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中, 把解释学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他批评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会歪曲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科学理解, 认为需要“深层的解释学”, 这种解释学更注意“劳动和力量” (work and power), 而不只是语言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 伽达默尔的最大贡献是把解释学同运用 (application) 或一般的实践联系起来, 但伽达默尔的实践概念是经不住推敲的。而他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上, 把分析性的科学和解释学作辩证的综合, 而成为一种批判的理论。

解释学十几年来在美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伽达默尔和利科 (P. Ricour) 最近十年每年都要到美国讲学。1970 年的一项专题讨论会, 有 C. 泰勒 (C. Taylor)、利科和伽达默尔参加, 对于美国哲

学界注意解释学来说是一件大事。泰勒曾受教于牛津，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但他立志要把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联系起来。近年来哲学家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的反思，发现了它们的解释学方面。许多社会科学家开始怀疑社会科学只是一种不成熟的自然科学的观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出现，标志着解释学进入科学哲学。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中谈到了这一点。库恩关于理论选择和范式转换的合理性概念恰恰是伽达默尔所要揭示的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库恩曾试图说明不同理论间的选择和范式转换是一种理性活动，但不是那种以演绎证明或证实、证伪为特征的理性活动。这种理性更具实践性，现在有人把它称为理论选择的实践理性。它的特征是：（1）选择和评价是信仰的转变而不是逻辑的算法；（2）是由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3）选择的标准，是作为价值而不是规则而起作用的。这些特征，恰恰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 *phronēsis* 这种推理形式的特征。库恩说他不是主张非理性，而是认为许多传统和标准的关于科学的合理性的观点，是不适合的和需要修正的。科学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什么意义上它是理性的，他认为这是解释学的任务，即以实践的观点来解释、澄清科学研究中的合理性的类型。从分析哲学家方面来看，解释学的影响只是在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出版以后，才出现了较强的趋势。该书最后一章“从认识论到解释学”可看作是该书的副标题。当然对于解释学的传播也不应夸大其变化的程度。美国许多思想家认为它是模糊的外来品，大可怀疑。然而重要的是在不同领域中都接触到了解释学的观点、重点和问题。不管怎样，对实用主义和解释学联合起来东山再起之势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谈到这里，我们似乎还可以再追问一下，上述当前西方哲学的开放、宽容、交融，及应用的转向和文化哲学的转向，实用主义和解

释学的复兴等等，这些现象的实质是什么？这种趋势的焦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实质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来解决主客观的矛盾；其焦点是主体性和实践问题。

三、主体性和实践问题成为焦点

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化，派别林立，变化多端。各种哲学运动在哲学观点以及哲学问题的侧重、术语、方法和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差别。这不仅使一般人如观烟云，难以把握，而且也使一些专业哲学家一度慨叹这些哲学运动之间产生了对话、交流的困难。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出现了一种开放的和相互宽容、接受的气氛。尽管如此，多元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然而，多元并不意味着一片浑沌；深刻的分歧证明存在着一个可以产生分歧的共同的领域。一定存在着秩序和规律性的东西。从各个哲学流派的横向比较研究中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的乃至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或红线就是主体性问题和实践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且可以说是 300 年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和发展线索。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在近代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从笛卡尔开始到康德完成。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笛卡尔提出了心(mind)的概念，心身(即主客体)的对立，又提出了“我思”为不可怀疑的基础来解决主客观的矛盾。这在实质上是开始强调从主体方面来探索解决主客体的矛盾。海德格尔就是把主体性的转折追溯到笛卡尔。康德把哲学变成了认识论，同时也把主体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把“先验自我”作为他的先验哲学，先验反省的一个绝对起点，强调它的先验综合能力，以求主客体的统一。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大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黑格尔则达到了